

木犁 Zhiguan · Zhiguan

书

系

# 直 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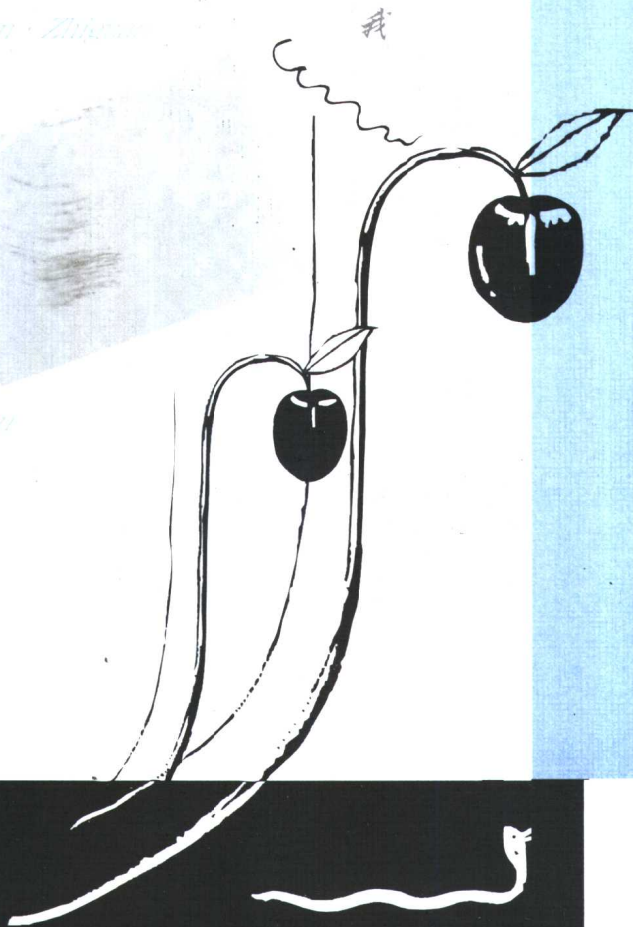
▲——赵汀阳学术自选集▼

思

文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赵汀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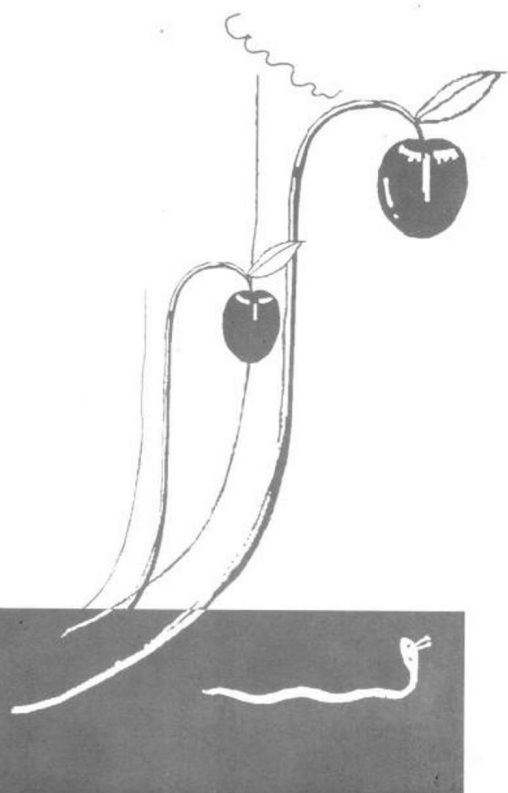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赵汀阳学术自选集▼

# 直 观

赵汀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直观: 赵汀阳学术自选集/赵汀阳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4  
(木犁书系·我思文丛)  
ISBN 7-5334-3023-9

I. 直… II. 赵… III. ①哲学-文集②赵汀阳-文集  
IV.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751 号

##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

我思文丛

## 直 观

——赵汀阳学术自选集

作 者 赵汀阳

丛书责编 黄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孙汉生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65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书 号 ISBN 7-5334-3023-9/Z·83

定 价 24.1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程，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 目 录

|     |               |
|-----|---------------|
| 1   | 前言：问题间性       |
| 10  | 伦理学思路的改变      |
| 59  | 道德的维度或生活的维度   |
| 82  | 法律的道德余地       |
| 90  | 真切的解释和灵活解释    |
| 100 | 人之常情          |
| 122 | 大模样伦理学        |
| 138 | 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之间   |
| 226 | 哲学的感觉         |
| 245 | 知识论之后         |
| 261 | 标准            |
| 269 | 不纯粹的现象学       |
| 282 | 二元性和二元论       |
| 300 | 从知识眼光到创作眼光    |
| 352 | 理解 20 世纪的精神财富 |
| 364 | 历史语法          |

370 形与势

374 两种故事，一种错误

378 正道人间是沧桑

382 有了一种全球眼光吗？

386 编后说明

# 前言：问题间性

在为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这本命名为《直观》的哲学自选文集时，不免又想起关于哲学的一些困惑。当埋头于某种工作时，人们总会暗以为它的意义是显然的，但只要一反思，却很容易发现意义有些失落，当然不是真的没有意义，只是意义像退潮一样远去。通常我们会觉得哲学就是专门在反思各种事情，但只要达到哲学的那种豁达境界，就往往发现“事情无非如此，如此而已”这样一种意义缺失的状况。可是假如哲学把各种事情反思成没有意义的，哲学自身又怎么能够有意义？人类学家王铭铭有一次半真半假地讥讽哲学家总是“过度反思”，这其实很有道理。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对于一个观念，人们总是



想象有一大堆解释或根据在那里等着。其实不然，解释和根据很快就会用完，很快就会发现无话可说，除非故意胡说。除非是神经病，否则总是胡说，自己也会失去耐心。哲学思考确实需要有某种限度，但哲学所应该追求的思想结果很可能并不是一清二楚的结论，而是一些有魅力的问题。

记得当年开始做哲学研究时，哲学家李泽厚警告说：“哲学这个东西怪得很，愚蠢的人越搞就越愚蠢，智慧的人越搞就越智慧，所以冒险得很。”这种话诱导人产生烦恼，尤其没有人告诉我，我是愚蠢的还是智慧的。这种烦恼并不算非常可笑，因为连维特根斯坦这样智慧的人都会去问罗素，他到底是天才还是白痴（他想的是，如果是天才就搞哲学，如果是白痴就开飞艇）。不过这种烦恼没有必要当真，看起来属于“一笑不了了之”的事情。有一个长时间的真正烦恼是，我们没有把握说哲学是什么样的一种研究，并且，不知道哲学这种思想的意义何在。以这种“学理性”的烦恼为背景，前面那种有些可笑的烦恼就变得不算太幼稚了，毕竟这涉及到一个哲学家想做出什么样的哲学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首先，无论是实证方法还是逻辑方法，不管有多么丰富的学识或者多么普遍的共识，都不可能确实证明某种哲学命题是真知识，同样也不能证明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获得哲学知识。这说明哲学思想不是一种知识，而这又多少暗示着，哲学不是能够“学”会的，而只能使人的智慧“超水平地”发挥出来。因此，哲学从来就只能是一种天才的活动（所以维特根斯坦担心他是不是天才），是一种思想艺术——它的思维方式与通常所说的那种制造艺术品的艺术其实非常相似，

都特别地依赖直观和想象力，只不过哲学的想象力制造的不是感性诱惑而是观念诱惑。既然哲学是天才的活动，那么，或者会哲学，或者根本不会。但是，什么样的思想算是有哲学水平的，这仍然很难描述，就像很难描述一个艺术品的水平一样。尤其是，像艺术和哲学这样的创作本来就缺乏严格的可比性，我们只能比较含糊地感受其中的才华。

除非哲学是一种知识，否则就无法比较准确地断定谁是更伟大一些的哲学家，可是哲学不是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比较哪一种对世界或生活的解释是真正的“答案”。到今天，事情已经相当明朗了，任何一种最后的答案都不是真正的答案，因此随便哪一种答案都是无所谓的，甚至人们不再需要最后的答案，就是说，且不管哲学是否能够成为知识，关键是人们不需要哲学去成为知识。哲学问题不需要答案，作为知识的哲学答案是多余的、有害的——试想想，假如像正义、自由、存在、真理、本源等等这类其大无比、笼罩着整个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了绝对答案，那么，不仅人们不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思想，而且不再有什么生活。关于人、关于生活的知识追求本身就是悖论性的：一方面，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得更有意义，就试图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目标；另一方面，假如人们获得关于生活的真知识，生活就反而失去了意义，因为不再有值得发现和创造的事情，生活都提前过完了，一种完全没有异常、例外、越轨、背叛和更新的余地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某些关于生活的知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让知识吞掉思想和精神，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永远不能以某种知识为基础，相反，知识永远只能漂在艺术上面。所以哲学不是

知识，而只能是一种艺术——既然哲学被设想为关于所有最重要问题的最后的思考。

由此产生另一个问题：假如哲学根本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标准答案”，那么哲学的意义又在哪里？换个角度说，要改变哲学的思考性质，就等于要改变哲学的意义，这显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尽管人们从来都不真正相信哲学提供的那些最后的知识，但是那些哲学的“大话”（言过其实的话）毕竟表达了各种理想或观念，这些理想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有助于人们形成各自的所谓世界观、生活观和社会理想之类的基本态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基本态度，人们的精神和行为将是混乱的。因此，虽然“大话”是不真实的，但是人们需要“大话”，以便使构成生活的那些琐碎小事、无聊过程和斤斤计较变得好像有意义，所以，哲学需要不断地说“大话”，或者说，生活需要哲学去说“大话”。当然，从知识的角度去看，“大话”是不真实的、荒谬的、夸张的，或者像早期分析哲学认为的那样，“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大话）。不过，知识的标准并不等于思想的标准，连后期分析哲学都发现大话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去看，正如前面说到的，“大话”是思想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功能，它是一种重要的胡说，却不是一种变态话语。显然，“无意义”（meaningless）不等于“无用”（useless）。

于是，问题变成了“怎样去说大话”和“说什么样的大话”，即大话的表述问题和大话的选择问题。虽然大话是言过其实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大话其实很重要，如果一种大话是智慧的而且构成了对生活的一种诱惑，那么这种大话就是

有用的。不过，大话本身还不是哲学，哲学仅仅是大话的一种。准确地说，哲学是“问题大话”，是把大话说成真问题。假如一种大话无法被说成必需思考不可的问题，就谈不上有什么智慧，而只是一些随便的街头狂想、伪科学的假设或诗意的意境（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深刻，但他把诗和思混为一谈却难以同情，哲学智慧虽然是艺术性的，但却不是能够这样“还原”的艺术性，哲学是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艺术）。

在我看来，要把大话说成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个关键的态度就是哲学必须成为语言的引诱者而不是被引诱者。就是说，我们要用被生活推到面前来的问题去引诱语言来形成思想，而不能被涌现着的语言所引诱，被五花八门的语言所暗示去讨论那些不真实的问题。一个词，一个概念有着它的暗示性，好像它真的意味着某个问题，有着特别的含义，也许有时真的是这样，但是有些词和概念，特别是哲学的专业概念，所表达的含义仅仅是语言里的问题而不是与生活的真实粘连在一起的问题，它们是一些由理性编撰出来的纯粹（pure）问题，比如说纯粹的自我、世界的本质、绝对精神、普遍必然的道德原理、纯粹存在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连还原、合理性、辩证等等也都是很生硬的问题）。它们当然是问题，但却不是由生活硬逼出来的不纯粹（impure）的问题。因此，那些纯粹的问题只能引起我们的理性上的好奇心，却与真实生活不相干。于是，对于那些纯粹问题的各种解释对生活来说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不相干导致无所谓（irrelevance makes indifference）——就是说，哲学家对那些生造出来的问题的不同解答可能个个都很

有趣，但这些不同的解答对于实际问题来说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同的解答形成了进一步的非争论不可的问题，而对于其它人来说，随便哪一种解答都挺好的，因为它们反正都没有用，至于理论的争论只不过是斗气。当哲学被语言所征服、所迷惑，哲学家就会觉得语词所暗示的所有问题个个都那么引人入胜，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远，一直走到和真实无关的地步。

语言本身是盲目的，逻辑本身是生硬的，但是我们却又不可能超越语言和逻辑。思想的这种悖论性的状况恰恰已经指明了真正的哲学工作：既然哲学是关于思想中最后的问题的思考，而那些最后的问题又都同时是关于思想自身的问题，那么，哲学就是思想的思想，而思想对自身进行思考，实际上就是与自身作斗争，就是防止思想稀里糊涂地走向那些脱离生活的无意义的目的地，也防止思想过于清醒地把某一种思想语法、逻辑和概念系统当成唯一合理的思想制度。

维特根斯坦最早感觉到了我们的思想障碍并不比心理障碍少，因此他声称哲学是一种思想疗法。从一个侧面去看，这种生动的说法是相当准确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被许多哲学家接受为一种有效的思想疗法。但是这种疗法有其局限，即使像后期分析哲学那样在什么是合法的观念上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例如重新考虑各种价值观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仅仅讲究关于任何一个我们愿意讨论的观念的恰当表述和讨论方式，我们还是没有把握相信恰当的表述和讨论方式是否能够消除思想病症。我倾向于认为通过分析哲学而发展起来的语言和逻辑分析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至少在今天已经不是哲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就是说，分析哲学的贡献是可接受的，但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大问题。

在今天，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把“某个问题”讨论出清楚的结果，而是需要思考和重新建立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或者是老问题的新含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对生活各方面问题的反思又提出了另一层问题。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化、全球化和全面反思的时代，各种问题以及各种问题的丰富含义正在纷纷被暴露出来，并且正在发生复杂的杂交性演变，因此，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成了最重要的也是最不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各种问题变得不清楚了？因为在新问题的干涉下，我们原来的思想格式（例如现代的知识至上的学术格式）、概念系统（例如逻辑编排的种属概念等级系统）和价值观念（例如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价值排序）都明显不够用了，不仅偏狭，而且失真，因此，即使我们固执地使用既定的思想方法把问题表达清楚，这种“清楚”本身就是可疑的。假如我们以为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可靠知识和方法足以套用，就像围棋的各种定式和棋谱一样，那就错了。人们一定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创造生活和历史的人们正是各种各样跃跃欲试的危险人物，电脑巨头、黑客、生物学家、金融投机家、发明家、技术人和传媒人以及其他怪人，他们所制造的生活难题恐怕不是现在这种学术描述和批评所能够对付得了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智慧、方法和观念体系。这意味着需要进入一个像希腊时代一样的开拓性的“哲学化”时代，哲学的工作需要有明显的变化。维特根斯坦的

“不要想，而要看”原则大概说的是，不要按照观念习惯想当然，而要返璞归真地观察和描述真实情况。这一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还不够，因为这只是知识论思维的最高境界。思想不仅仅需要真切地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生活形式”或“不得不接受的真实”，而且还需要去创造真实，人类的创造性工作正是生活真实的核心部分。因此，“真实”（the real）对于人类来说是双重问题：既是知识问题又是创作问题。从哲学史上看，作为创作问题出现的“真实”一直是个思考弱项，现在我们需要思考它。正如前面所言，传统哲学的“大话”是重要的胡说，它给出了关于世界、生活和社会的不真实的总体解释。虽然不真实，但却是我们因此能够思想的一些“借口”和“诺言”，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凭借一些谎言，否则就无从理解真实，就像我们以梦想为背景去理解现实一样。但是当观念大量堆积起来后，大量的梦想，大量的谎言，大量的解释使梦想和观念发生贬值，使人类的整个思想画面变得过于虚假和无聊。这时，另一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了，我们不得不把整个观念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思想画面，然后思考如何创作一个对生活真正有魅力的思想画面。或者说，当我们知道关于生活和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时——就像苏格拉底发现人类自我认识终究以无知为结果一样——我们就发现所需要追求的思想其实并非知识而是艺术，“知识问题”就转化为“创作问题”，或者说“魅力问题”和“诱惑问题”。

我以为这是哲学的新任务，所以试图进行“大模样思考”——不是思考逻辑可能上最大的问题，这种“大问题思考”是经典哲学的思考方式——而是思考一个问题和所有问

题之间的关系，是要拒绝对特定问题的那种限制性很强的专业思考，特别表现为迫使每一个问题都面对其它所有问题，使每一个问题都把其它问题看作是它的生态条件，于是思考就不再是专注于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而是问题间性（the interaction of ideas or problems）和问题间的合作交往（inter-course），由此也许能够有助于建立问题间的有活力的生态关系。



# 伦理学思路的改变

重  
观  
·  
伦  
理  
学  
思  
路  
的  
改  
变

## 1. 伦理语句与伦理问题

为了使伦理学的问题明朗化，有必要对伦理语句进行分析。这其中涉及一些一直很混乱的问题。

事实表达式以 to be 为形式，价值表达式却好像有两种形式——至少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即 (A) ought to be (应该) 和 (B) to be good (是好的)。在 (A) 类型中又似乎有两种模式：(A-1)，这是非伦理性的，例如“在足球赛中不许用手帮助运球”；(A-2)，这是伦理性的，例如“不许撒谎”。是什么东西使得 (A-1) 和 (A-2) 具有不同性质？是什么理由使得我们觉得 (A-1)